

山东古代道路史

(送审稿)

山东省公路管理局

一九八五年八月

前　　言

为了阐述山东古代道路的演变情况，揭示其发展规律，做到古为今用，承前启后，鉴往知来，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的领导和部署，我们编写了中国公路交通史丛书《山东古代道路史》。

对《山东古代道路史》的编纂工作作如下说明：

- (一) 《山东古代道路史》是经过广泛深入搜集资料，编资料汇编，在编写过程中不断充实、丰富资料，对资料进行核实、鉴定，然后编写而成的。
- (二) 《山东古代道路史》基本上是按编年体来写的。全书共分先秦、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四章。每一章的内容主要按时间先后来排列，同时包括一些贯穿整个时期的专节。另外，附有古代道路大事记。
- (三) 古代和近代是按照通史以1840年鸦片战争分期的，这是因为从鸦片战争起，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在山东修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在青岛开始修公路，山东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交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 (四) 根据略古详今的原则，古代道路内容较略。但由于山东是我国古代文化发源地之一，交通占有重要地位，因此古代道路仍占一定的篇幅。

编写公路交通史是一项新的工作，没有先人的成果可以借鉴。我们通过广征博采，精心编辑，虚怀若谷，从善如流，切磋琢磨，边学边干，才使这一工作得以完成。

敬录

目 录

前 言	
古代道路概述	(1)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山东道路	
第一节 从文化遗址看殷商及以前的山东道路交通	(4)
第二节 西周道路建设及路政管理	(4)
第三节 春秋时期山东境内的会盟征战与道路交通	(8)
第四节 从齐币出土和两次大的战争看战国时期的山东道路	(10)
第二章 秦汉时期的山东道路	
第一节 秦代道路概述	(15)
第二节 秦代山东主要道路	(16)
第三节 汉代商业都会与道路	(19)
第四节 汉代道路的管理	(20)
第五节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东道路述略	(22)
第六节 秦汉时期的桥梁	(23)
第三章 隋唐宋时期的山东道路	
第一节 隋和高丽、日本的交往与山东道路	(25)
第二节 唐代山东道路在中外交通中的地位	(26)
第三节 唐代的驿道及其管理	(30)
第四节 宋代山东道路的特点	(31)
第五节 隋唐宋时期的桥梁	(33)
第四章 元明清时期的山东道路	
第一节 元代的驿道及其管理	(39)
第二节 明代的道路	(41)
第三节 清代的官路与大路	(43)
第四节 清康熙时运孔庙碑和清乾隆巡游山东路线	(45)
第五节 元明清时期的桥梁	(46)
古代道路大事记	(57)
后 记	(61)

古 代 道 路 概 述

山东位于太行山东，黄河下游，濒临渤海、黄海，泰山雄峙其中，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又为北京门户，地位十分重要，文化发达，为齐鲁之邦，孔孟故里。人民勤劳勇敢，富于革命精神，历代许多重要的农民起义，发生在山东。由中原至东部沿海，由北京到南京，货物转输，粮食调运，驿使往还，军报递送，都取道于此，自古为交通要冲。

殷商以前，年代久远。从龙山文化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当时山东道路的概况。

西周统治者在不断向周围地区用兵，扩大疆土的同时，加强了道路交通建设。山东境内被作为战略要地，开辟了许多交通线，直接与国都镐京（今西安西北）的大道相连。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后，从镐京经洛邑、鲁都直达齐都建立了东西大道，即周道。周道为当时的军用大道，是西周统治者加强对东方各民族统治的重要工具，《诗经》关于周道有许多描述。说周道是“君子所履，小人所视”^①。说明西周统治者对东方各民族的歧视。灭奄建鲁后，以鲁都（今曲阜）为中心，开辟了几条交通干线。据《周礼》记载，周代有司空专管道路，按时对道路、桥梁加以修治，“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②。道路上有供人食宿的馆舍，道旁植有树木，还提出了田亩、灌溉与道路的综合治理的设想。

春秋战国时期，山东境内的会盟征战与道路有着密切的关系。既要是会盟就要选择道路交通便利的地点。同样，各国的战争也促进了道路交通的发展。春秋时齐晋鞍之战，齐鲁长勺之战，战国时齐魏马陵之战，燕将乐毅破齐，以及战国时有名的午道，也都在山东。从战国时齐币的出土，可以看出当时商业与交通的概况。

秦统一中国，实行“车同轨”“堕坏城廓，决通川防，夷去险阻”^③，消除妨碍经济发展和阻塞交通的消极因素。特别是修治驰道，“东穷燕齐，南极吴楚”^④。山东境内的东西驰道，经过定陶、曲阜、历城、临淄、东莱、芝罘、成山，是秦王朝一条政治、经济、军事大动脉，是秦始皇巩固政权的重要工具。秦始皇五次出巡，三次到山东；秦掠夺齐国、燕国从人民中搜刮的财富，主要利用了这条道路。

汉代建立，除利用原有的驰道外，为了开拓疆土，征服少数民族，还开辟了许多工程较大的道路。这时，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于是富商大贾可以周流天下，道路所经过的大都会，如山东的定陶、临淄，成为全国性的商业大都会，道路交通促进了商业的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期，干戈扰攘，山东新修道路，史无记载，只是西晋时，由于新筑广固城（今益都西南）取代了临淄的地位，山东东西大道也就由长山转向东南，不经过临淄，而经过益都，改变了原来的走向。

①《诗经·小雅·大东》

②《国语·周语》“单子知陈必亡”。

③《史记·秦始皇本记》

④《汉书·贾邹枚改传》“贾山至言”

隋唐时期与高丽有和有战，与日本也有交往。尤其是唐代与我国边疆渤海，以及与朝鲜和日本，都有过极为密切的关系，山东东西大道成为隋唐进攻高丽的军事路线，也成为日本“遣唐使”和中国派往日本、朝鲜的和平使者往还的重要路线。据《元和郡县志》记载，当时由长安经洛阳到山东的主要路线，就是由曹州（定陶）、兗州、淄州（淄川）、青州（益都）、莱州（掖县）到登州（蓬莱）的这样一条东西大道。而山东各州之间都有道路相通。山东的绸丝织品，经过这些道路集中到东西大道上，然后运往洛阳、长安直至丝绸之路，山东东西大道成为当时的重要经济命脉。

宋代建都汴京（今河南开封），长安、洛阳虽仍不失为重要的商业都会，而道路主要由汴京向四周辐射。当时山东道路上运往汴京的土特产品，络绎不绝。南宋时，由于金人据有山东北方，当时由青州向莱州、登州的路线，为青州至密州的路线所代替，而密州的板桥镇（今胶县境）当时设有市舶司，为重要的通商口岸。

元代崛起北方，是中国历史上驿传制度的全盛时代，驿道布满全国。由于版图极大，没有完善的驿传制度，是很难维持其统治的。元代定都大都（今北京市），所有道路都从大都向外辐射。山东在元时属腹里（近畿的意思），从腹里驿站的星罗棋布，可以看出元时山东驿道的四通八达。

明代起初定都南京，明成祖迁都北京，仍置两京，由于元明以来改变了过去许多朝代建都中原的情况，因此道路也由以东西大道为主变为南北大道为主。由于贡赋和粮食仰给南方，两京之间在山东的道路，一由德州经济南、泰安、兗州至徐州，一由德州经高唐、东阿、东平、兗州至徐州，就显得特别重要。而原来的东西大道仍不失为主要道路。除了这些主要道路以外，据《读史方舆纪要》记载，明代各府、州、县之间，都有大道相通。

清代道路主要为官马大道。经过山东的为福州官路和广东官路。广东官路在明代即为重要驿道，而福川官路由泰安经沂泰、临沂、郯城、红花埠一段，则是清代才成为官马大道的。清初，山东东西大道由于通王村道路的开辟和周村的兴起，其走向改由王村经周村而至张店，再一次进行了改线，促进了周村工商业的发达。清代除官马大道外，各府、州、县之间亦有道路相通。

古代桥梁，最初以砾石或石块铺成石磴，以渡涉行人，秦筑驰道，堑山堙谷，在河流溪谷之间，当造了不少桥梁。晋代杜预善于建桥，他在山东也造过桥。隋代造桥技术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山东东平清水河桥，据《元和郡县志》记载：“与赵州桥相埒”。可惜于宋时黄河改道中埋没。宋代益都牢城废卒修建虹桥，为全国首创，曾经在八百里的汴河上推广，在山东古代建桥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兗州屯头村发现的信女桥碑，上面刻有李自成“大顺国”国号和“永昌元年”年号，证明为1644年李自成建立革命政权时所修，当时山东人民已经拥护李自成农民革命政权。山东现存古桥，最早建于宋金时期。元明清各代桥梁，至今仍保存不少，仅益都县就有31座。这些桥梁多半是石板桥和石拱桥，有些至今仍发挥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从古代山东道路发展的历史，可以说明以下问题。

（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古代山东道路桥梁，都是劳动人民勤劳智慧的结晶。他们是古代道路的开路先锋，对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那些统治

阶级的倡导者，也起了一定的历史作用。

(二)古代山东道路桥梁，主要是历代统治阶级为了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军事镇压而修建的，劳动人民付出了巨大的劳役。但是这些道路桥梁的建成，对于政治统一、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古代山东一直是道路交通要冲，历代帝王建都于长安、洛阳、开封者，其与东方以至朝鲜、日本的交往，都有赖于山东的道路交通。历代帝王之建都于北京者，其沟通南北，取给江南财富，以至与南洋诸国的交往(经过山东的广东官路有使节路之称)，也都要依靠山东道路交通。

(四)道路主要是为物资运输、驿使往还、军报递送服务的。山东历史上盛产丝绸、粮食和其他土特产品。这些物资仰赖山东道路加以集中，然后利用山东东西大道或南北大道运往全国各地，同时从全国各地运来山东所需要的物品。这对于促进经济繁荣，满足人民生活需要，起了重要作用。

(五)道路促进了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古代许多商业都会的形成和繁荣，都和道路分不开。一些新的城市的兴起，促使道路改移，道路的改移，反过来促进城市商业和手工业的发展。

(六)山东地处东方沿海，历代尤其是隋唐以后，对日本有着密切的和平交往，对朝鲜则有和有战，山东道路成为与日本、朝鲜使节往还的重要路线，也成为进攻朝鲜的军事基地和供应基地。

(七)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都到泰山封禅，到曲阜祭孔。也促进了山东道路的发展。

(八)从古代山东道路史，我们可以看出，当国家处在和平安定时期，处在大一统的局面，如秦、汉、隋、唐、宋、元、明、清建代之初，道路就发展。到了这些朝代的末季，干戈扰攘，战争既利用道路，也破坏道路，道路的发展，就受到一定限制。但道路交通总的方向还是向前发展的。

(九)在漫长的古代历史长河中，道路桥梁的技术，虽然进步很慢；但总的来说，还是在不断进步的。从桥梁来说，由用大小砾石或较整齐的石块筑起一个接一个的石磴，以渡涉溪流小河，到独木桥，石板桥，石拱桥。这些技术上的进步，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但功劳往往为统治阶级所窃据。宋代益都牢城废卒首创虹桥，《宋史》把功劳归到宿州州官陈希亮身上，即是一例。现在已经使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二

第一章 先秦时期的山东道路 (公元前221年以前)

第一节 从文化遗址看殷商及以前的山东道路交通

远古山东道路交通，因年代久远，无可稽考。到了上古，~~有文字的根据史籍和出土文物，了解山东境内的部族、居民点或城镇、国家，从而推知各部落、居民点或城镇、国家之间有交通往来。~~

近代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1928年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发现新石器文化遗址，就是所谓龙山文化。象这类龙山文化系统的遗址，以后又发现多处，分布地区，大体以山东濒海地区为中心，向西经鲁西入豫北，向西南由鲁西南的滕县、薛城入豫东，向北出省境到达辽东半岛，向南出省境到达苏、浙、闽、台诸省①。而山东境内除城子崖外，还有日照两城镇，乐陵的五里冢，禹城的周尹庄，济南的大辛庄，邹县的漆城，滕县的官家庄，济宁的文家庄，~~泰安的大汶口~~，安丘的景芝镇，五莲的丹土村，临淄北门外，文登的石羊村，黄县的龙口，即墨的姜家泊，青岛市的李家宅头等处②。这些文化遗址，可能是新石器时期的一些部落或居民点，它们之间当有交通。

到了殷商，山东半岛成了商族最先的居住地③，山东省成为商朝的后方④，殷虚出土的龟甲、鲸鱼骨、鲟鱼骨、海贝等都是从东海或南海运来的。这说明当时的山东沿海与殷有交通⑤。

第二节 西周道路建设及路政管理

周灭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原来的统治地区。周朝统治者采取了分封诸侯的办法，以维持其统治。周成王把武王弟康叔分封在原商王所在的地方，建立卫国。周公子伯禽被封到原来的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今山东曲阜)。成王还特意给了伯禽一套典册文物，就是《周礼》(公元前1000年前后)。成王把姜尚封为齐侯，统治薄姑氏的土地和人民，都于营丘(今山东临淄北)。周公东征(公元前1113年)时，命召公授权尚父说：

“东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五侯九伯，实得征之”⑥。齐国附近有不少东夷小国，先后被齐国并灭，因而齐国成了周朝的东方大国。齐、鲁、卫分别统治着武庚发动叛乱的地区，是周朝控制东方的重要支柱。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西周统治者在不断向周围地区用兵、扩大疆土的同时，加强

①《中国上古史》，王玉哲著，第23页

②参看吕振羽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

③见《中国上古史》

④⑤参看《中国史稿》第一册

⑥《史记·齐太公世家》或《左传》僖公四年。

了道路交通的建设。山东被作为战略要地，通过分封的诸侯，以各自的首都为中心，开辟了许多交通干线，直接与周都（今西安西北）的大道相接。

灭奄建鲁后，鲁国仿效周都，以鲁（曲阜）为中心，开辟了几条交通干线。

向南：自鲁（曲阜）经邾（今邹县）滕（今滕县）直达彭城（今徐州）以南的交通大道。这是继周公东征之后，鲁国与南方联系的主要道路。向西南：自鲁至负瑕（今兖州）经任国（今济宁）、唐（鱼台县武台）、费（鱼台县城西）、茅（今金乡西南）、郜（今成武）、都邑（今定陶）、曹（今曹县）、宋（今河南商丘县）到达东都成周（今河南洛阳）的交通干路，既是鲁国向周王室的朝聘道路，也是周王朝同它所属东方各国保持政治联系的主要道路。向北：自鲁经姚村到郕（今宁阳）、太安、嬴邑（今莱芜）绕泰山以东至谭国（今济南东平陵西南），再向北向东沿东西大道到达齐国（今临淄）。向东：经鲁克蔑（今泗水卞桥南）以后，向东的道路也基本打通，又经卞邑（今泗水县卞桥）、颛臾（今平邑东）直至莒国（今莒县）、邾国（今邾城）一线，成为著名的古代东西交通大道。向西：自鲁城经负瑕至鲁邑阙地（今汶上南旺，这是鲁先公坟墓所在地），再经中都（今汶上西）、黎（今郓城西南）、顾（今鄄城）去卫国（今河南濮阳、淇县），也是鲁国与西方诸侯国联系的必经之路。

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若干年后，洛邑建成陪都，解决了国都镐京对于统治广大的东方“鞭长莫及”的困难。齐、鲁、卫各以自己的首都为中心修了许多互相通达的干道，从而建成了一条从镐京到陪都洛邑经鲁直通齐都的大道。这大道就是所谓“周道”。《诗经》中的“大东小东”，即远东近东，“东人”、“西人”即东方人民、西方人民。东方人民，是指现在陕西以东的从前商王畿及商附属国的人民；论地区，即指现在的河南省、山东省、河北省南部以及湖北、安徽、江苏的一部分。西周朝庭在今陕西西安附近，因此，对于镐京来说河南算是“近东”，河南以远，皖北、山东省一带便算是“远东”了。这条由镐京向东方伸展的大道，就是后来秦始皇所修筑的向东方伸展的“驰道”的基础①。

周道是周朝连络东西方的一条干道，一条主要用来对付东方人民的军用道路。这条军用道路上的镐京、洛邑、卫国分别驻扎着周天子直辖的三部分军队：镐京的“西六师”，陪都的“成周八师”，卫国的“殷八师”。这二十二个师的兵力，主要是用来镇压东方人民、包括东夷、淮夷的，而“殷八师”住在东部，自当是前哨。所以成王时代的《小臣谏殷》有这样的记载：“歟！东夷大反，自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第六册，转引自《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孙作云著）按“歟(zha扎)”，是表惊讶的词（把手指伸张开），自懋父，可能是殷八师的统帅，东夷，包括山东在内的东方人民。

周道的特点是平而且直。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有不少篇目记叙了“周道”及有关的事情。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诗小雅、大东》）砥，磨刀石；矢形容象箭一样的直。履(lu吕)走，踩。这里既说明了周道的平直，又表明了这条道路的权属。道路平直，便利于行车。“所履”、“所视”显示了“君子”指周本土的奴隶主统治阶级与“小人”指东方诸侯国的人民

①参看《诗经与周氏社会研究》孙作云著。

的不同身份。如砥的周道，是“小人”所筑，而“道”的所有权和使用权却是那些“君子”，“四牡骙骙，周道倭迟（长貌）”（《诗·小雅·四牡》），“有栈之东，行彼周道。”（诗、小雅、何草不黄》）是说在四匹雄马拉的军车前面，一条大道伸展到很远的地方，有高大车篷的役车，行进在那条大道上。这两句是说周道长且宽广。

这条军用道路很能说明周人政治势力的消长。因而西周末年，周幽王时，周室衰微，“叔蹶周道，鞠为茂草！”按“蹶（ti剔）蹶”平易貌。“鞠（ju菊）”，阻塞之意。这就是说，平坦的周道已被茂盛的荒草给阻塞了①。

周代道路的治理，在《周礼》中说的相当具体明确；这虽只是理想的交通制度，事实上并未付诸实行，但作为国家的统一规划，其完备程度确乎是空前的。

周代道路建设，有专管的官员，叫做司空，修路修桥，都有明文规定。司空“以时平易道路”②，通常是“季春三月，令司空官周视原野，开辟道路，毋（无）有障塞（障碍、堵塞③）”。“岁三月，命司空通道路，无有障塞”④。《国语·周语中》说“九月除道（清除道路），十月成梁（架设桥梁）。”《孟子》则说：“岁十一月徒杠（通徒步的木桥）成，十二月舆梁（可通车舆的桥）成”看来周代修路，修桥，都在雨季过后。

周代道路分为五等，规格不一。《周礼》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环涂以为诸侯经涂，野涂以为都经涂。”就是说，匠人掌管国道建设。城中叫经，涂容九轨；绕城叫环，涂容七轨；城外叫野，涂容五轨。郑玄加注说：“广狭有定数，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容二轨，轨凡八尺。”这就是说，周时道路的广狭大小，有明确的规定。（涂一轨，合古尺八尺，今尺1.59米。九轨则为七十二尺，合今尺14.33米）。

周代的路政管理，即关于道路桥梁、车马和礼宾馆舍等的管理均各有专官，各有规章制度。管道路桥梁、车马和礼宾馆舍这三类官中，都分别有属于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及其职责的记载。如《周礼·地官遗人下》说“凡国野之道，十里有庐（舍），庐有饮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馆，候馆有积。”大意是，国野中的道路，每十里、三十里以及五十里的距离，设有三种不同的馆舍，每个馆舍中备有饮食或储存的物资，以便旅客享用。这是《周礼》的馆舍制度。《秋官野庐氏下》说，“野庐氏掌达国道路，至于四畿（近都城的地方）。比（靠近）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住处村落），若有宾客，则令守涂地之人聚拆（tuō托），（巡夜者击以报更的木梆子）。有相翔者（行为不轨的人）诛之（惩罚他）。凡道路之舟车击互者，叙（次第）而行之。凡有节（符节，指宾客）及有爵（官职爵位）者至，则为之辟禁野之横行径踰（即逾，越过）者。”大意是，对于宾客，严加保护，对夜行和行为不端的人要加倍防范，必要时给以制裁。《夏官司险下》说：“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设国之五沟无涂，而树之以林，以为阻固，皆有守

①参看《诗经与周代社会研究》，孙作云著

②《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③《周礼·月令》

④《吕氏春秋·三月纪》

禁，而达其道路。国有故（事故），则藩塞（国内交通阻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僚属）守之，惟有节者（有执照的人）达之。”大意是，司险根据九州图，全面了解全国的山林川泽，设想在全国修五沟、五条道路，路旁植树，派人守卫。国家有不测事变，则阻止行人，只让有执照的人通过。道路关险，在平常的时候各有规定，非常的时候各有禁令。这是《周礼》中道路交通的行政管理制度。《秋官讶士下》说，“邦有宾客，则与行人送逆之，入于国则为之前驱，而辟野亦为之，居馆，则率其属而为之跸（bi毕，开路清道），诛戮暴客者。”这是说，国家有宾客，要为之迎送，入国境，要为之引路，住宿，服务人员要为其开路清道，严惩肆意侮慢宾客的暴徒。这是《周礼》中招待和保护旅客的制度。

侵害

《周礼》对于车的配给也有具体规定。王后、卿、大夫、士、庶人，都各有自己的专用车，而王子宴会丧祭，因场合不同，又有各种不同的车。

道路的修治与管理，体现了一个国家治理的水平。“雨毕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是说雨停后最宜于清除道路，河流水位枯落时最宜于修桥。“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意思是道路两旁应植树，在边野地方应储备粮食，以供守护道路之用。这说明，那时不仅已重视道路修治，同时也注意道路绿化和养护等管理措施了。而道路修治管理不善则被认为是政治腐败的表现。所以周定王的卿士单襄公到陈国谴责陈侯说：“道茀（fu扶，道上杂草）不可行也，候（候人，掌管迎送宾客的）不在疆（疆境），司空不视涂（途），泽不陂（障碍），川不梁（桥），野有庚积（露在外边的谷物），场功未毕（修打谷物未完），道无列树（道旁没栽树）。”并据此断定陈国必亡①。

单襄公列举“陈必亡”的十五条事实，与道路有直接关系并且非常重要的就有三条。他认为，第一，道路要按时去修理，泽潦要按时去陂障，河川要按时建桥。第二，道路两旁，要栽植树木，以作道路的标记；郊外沿途要设置屋庐，储藏食品，作为守卫道路的处所。第三，设司空，管理路政。就馆舍而言，对各等不同阶级的宾客，有各种不同的招待办法，以使“宾至如归”，对于一个宾客的各方面，只要合乎规章，都要使他们安适满意②。

周代田野道路规划与田亩治理是结合考虑的。周代的“井”田制承袭于商代而有所发展，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亩制和比较完整的灌溉、道路系统，是“井”田制完备的雏形③。遂人是掌管六遂（郊外地区）的土地和人民的官。《周礼》说，“遂人凡治野（郊外），夫（百亩）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zhe n枕）、百夫有洫（xū叙），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jī机，国都附近的地方）。”④这里所说的遂、沟、洫、浍、川，都是用以通水于河川的，属灌溉系统；而径、畛、涂、道、路均属道路系统。田亩、灌溉、道路配套，三位一体。

综观西周道路的修治和规则，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西周道路的建设和管理，首先

①《单子知陈必亡》，载《国语·周语中》，转引自《古文观止》。

②参看白寿彝《中国交通史》

③《中国史稿》第一册

④转引自《周代商业及交通》，金文鼎著

出于统治阶级政治和军事的需要。其次，在“井”田制的基础上逐步完善了道路、田亩和灌溉的三结合的系统。第三，这种“三结合”的系统的建立，是当时西周政治稳定的体现。第四，《周礼》这部书中关于道路修治虽只是道路规划的条文，但对后来的道路建设与发展有先导作用。

第三节 春秋时期今山东境内的会盟征战与道路交通

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历史上称为春秋时期。春秋时，周室衰微，宗周旧城中的诸侯国互相兼并，黄河上游的秦，中游的晋，下游的齐；长江上游的楚，下游的吴越，都是较大的诸侯国，山东境内的两大强国是齐国和鲁国。

齐国先后灭纪、鄣、谭、遂、鄣、阳、介、牟、仕、薛、郭、夷、州等13国，最后灭莱，把今山东北部的大部分地区统一起来，势力达到今河北省南部一带。鲁国先后灭奄、拯、项、须句、向、祝、郝、邿、鄅、单、禹、鄅臾等12国，而成为山东的一个大国，统一今山东南部大部分地区①。

当时各国之间最注重会盟。所谓会盟，就是诸侯间的集会和订约，既有联盟，又有斗争，是诸侯间政治和军事力量检阅的一种形式。既为会盟，当然参加的就不止一两个国家，会盟的地点也一定要经过选择，确定最恰当的地点，注意到道路交通。以齐桓公来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曾举行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②。他们所聚会的地点有的在济水以北，有的在淮水中游。所谓兵车之会，即鲁庄公十三年会于北杏（齐地，山东旧东阿境），十四年会于鄄（卫地，今鄄城附近），十五年又会于鄄。鲁僖公九年会于柽（cheng称，今河南淮阳县），十三年会于咸（今河南濮阳县东南），十六年会于淮（淮水中游）。所谓乘车之会，即鲁僖公三年会于阳谷（今阳谷县东北），五年会于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九年会于葵丘（今河南兰考县东南）。其中北杏、鄄、阳谷及咸皆在济水以北。据记载，诸侯遣使会盟在今山东的尚有蔑（鲁国姑城）、宿（东平无盐）、潜（鲁地）、石门（齐地）、艾（泰山东南）、防（鲁地）、鄆（鲁地）、嬴（泰山附近）、讎（济北蛇丘附近）、咸（鲁地）、曲池（鲁地）、黄（齐地）、趨（cuy催上，鲁地）、泺（泺水在济南历城县西北入济）、蔑（鲁地）、柯（济北东阿）、薄姑（齐地）、曹南（鲁地）、洮（鲁地）、向（营地）、谷（齐地）、蒙（今蒙阴）、顾（齐地）等二十三处，关乎到鲁、邾、宋、戎、纪、莒、齐、鄅、卫、陈、杞、燕、蔡、许、滑、滕、曹、江、黄、邢、鄅、小邾、楚、秦、晋、薛、吴、越、胡、沈、白狄、顿、徐、鄅、鄅臾、东夷等今山东境内及其周围的国家共三十多国，所涉及的地区相当广大。这就大大促进了道路建设。

①参看《中国史稿》第一册《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罗伸言著

②见《国语·齐语》。

《史记齐大公世家第二》谓兵车之属三，乘车之会六，备考》。

各国的争霸战争也促进了道路的发展。齐桓公曾经亲自南伐过楚国，他渡过汝水，越过方城（在今南阳北），还曾越过太行山，其征伐路线自当经今鲁西或鲁西南。

就山东诸国来说，齐、鲁对于中原的郑国是没有任何威胁的。但是由东方诸国到中原，郑国依然是一个交通的枢纽。齐、鲁两国和周王室的关系比较密切，他们和周王室的来往，自然要经过这条道路。春秋初年，周王室的凡伯奉使往鲁国，归途为戎人在楚丘劫掠^①。楚丘在今山东曹县东南，从当时的情形来说，这个地点恰是处于鲁国和郑国的中间，正是往来必经之路。

齐国和晋国往来的道路，还要在楚丘的北边。这可以由齐晋两国鞌（ān，同鞍）之战中看出来。这一战争发生在公元前589年（即鲁成公二年）。据《左传》记载，是年，晋师的东行，首先是经过卫国。由卫国入齐境，最先到莘（今山东聊城地区）。由莘东行，再到靡笄之下。靡笄（mǐ jī），山名，在今山东长清县^②。由靡笄之下再东，两军遂战于鞌。在战争中，晋师逐齐，三绕华不注。（华不注，山名，俗称华山，在今济南北郊）。靡笄之下与鞌都在济水之南，晋师由卫东行，显然是循泰山之北和济水之南向齐都临淄进发的。

齐、晋鞌之战后，齐国失败，晋国获胜。晋国所要求的条件就有“齐之封内，尽东其亩”^③一条。意思就是齐国应该把境内的农田都改成东西行。如果齐国按照晋国的要求改变农田的耕种的方式，以后晋国再向齐国用兵，兵车往来当然更方便了。但齐国根据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实际出发，拒绝了晋国这种要求^④。

历史上著名的长勺之战发生于齐、鲁之间。公元前684年，齐桓公借口鲁国曾经帮助过同自己争做国君的公子纠，从临淄出兵，攻打鲁国国都曲阜。战争迫在眉睫，鲁国危急。据《左传·曹刿论战》记载。曹刿问鲁庄公：“何以（靠什么）战？”鲁庄公谈了几个具备的条件，曹刿都认为不能恃以为战，鲁庄公最后说：“大小之狱（大小案件），虽不能察（都查清），必以情（力求合理）。”曹刿说：“忠之属也（是忠实为人民办事的行为），可以一战，战则请从（请让我跟着您）。”于是鲁庄公在政治上取信于民，在战略上知己知彼，并善于掌握反攻和追击的有利时机，亲率鲁军，从曲阜出兵，在长勺与齐军相遇。鲁庄公等到齐军击鼓进攻三次，士气已衰，而鲁军士气被激怒正在旺盛之际，即由防御转入进攻，一鼓作气，穷追猛打，打得齐军急从长勺溃退，返回临淄。长勺，当在今莱芜县城西北的口镇附近。因这里是一山区小平原，适于当时的车战。齐军的进军路线，当是由临淄南下，直达交战处的长勺。鲁军的进军路线，当是由曲阜北上，直达长勺。由于大部队行军，并带有战车，可能不只走一线，而走两线以上^⑤。

①见《左传》隐公七年。转引自《河山集》。

②见江永《春秋地理考实》。转引自《河山集》。

③《齐国佐不辱使命》（成公二年），载《左传》。

④见《河山集》史念海著。

⑤明嘉靖《青州府志》载，“齐闵王出师伐鲁开道”于青石关，时间是公元前300—280年间。青石关在颜神庙西南，俗名杨家关，不在张庄—淄川—博山—长勺线上。备考。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春秋时期山东的道路交通已经有了相当的规模。车辆的使用较为普遍，商业的发展，诸侯会盟，战争征伐，使道路的开拓与修整日益被重视起来，甚至战胜的诸侯国，也以修整道路要挟战败国，可见对于道路交通的重视。

第四节 从齐币出土和两次大的战争

看战国时期的山东道路交通

近年来，山东出土了大量齐币。经考古工作者的分析，认为战国时期的齐国，最主要的是铸币齐法化。所谓“齐法化”，就是齐标准货币的意思。齐币分布广泛，其范围几遍今山东。齐币的大量出现，显示了一个历史侧影：战国时期齐国的商业及道路交通是相当发达的。

自周武王封太公望于齐后，就竭力“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春秋时期，由于商业的发展，商人的力量已经影响到齐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道路交通。到了齐桓公称霸时期，齐国的确成为“运桔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财物之所遵”的国家。这是商业有相当重要地位的说明。齐都临淄已是手工业和商业很发达的都会，金属铸币也就成为交易的手段，于是出现了齐刀币。如齐建邦、安阳、谭邦等前期“法化”。

战国期间（公元前475年—前221年），齐国的社会制度，已由奴隶制逐渐转变为封建制。由于商业的进一步发展，货币需要量大大增加，而且，在一个政治势力范围内，如封国之内，也要求统一货币，促使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齐币，特别是齐“法化”集中出土在齐故城临淄，是因为战国时期齐都临淄是一个拥有七万户的大都会。齐币在平度、即墨、日照、诸城等地出土，是因为齐东的琅琊、即墨之富饶；同时，诸城、日照一带是当时齐与吴、越贸易的地区。齐币在蓬莱、黄县、招远等地出土，是因为齐北有渤海渔盐之利。齐币在济南、历城、平陵出土，是因为这些地区是齐国与西方各封国进行贸易的集散地，是齐国国都联系当时“午道”交通命脉的咽喉地带。齐币从福山、牟平一带出土，是因为这个地区是齐国的海上贸易集散地。齐币从平原县出土，是因为这里接近齐之大邑高棠（今禹城西北境）。高棠是齐景公赐给重臣陈桓子的赏邑。陈据此地，逐渐强大，最后代替了姜姓齐国。这个地区是齐与赵、卫进行贸易的集散地。齐币从青岛以北流亭、女姑口、城阳出土，是因为这一带商业发达，齐在灵山卫设关征税，必然会有商贾百姓往来无阻的道路。至于城阳（古高密），齐之夷维，原是春秋末期晏平仲的食邑，而贵族的食邑，往往是集市之地。

为什么莒南一带也出土不少齐币？因为这一带是楚国进行商业贸易的接触地带，是汝汉之黄金、生鹿与齐之冠带、皮革、石壁、鱼盐的集散地。

齐币的出土，一方面反映当时以临淄为中心的商业兴隆、发达，另一方面也反映与之相适应的道路交通的开拓、发达。当时齐国的交通要道有以下几条：

1、济南、历城、城子崖（今章丘县境）、东平陵（章丘）、章丘、淄博、临淄、益都、昌乐、潍县、平度、莱阳、栖霞、福山、牟平、荣成一线，是横贯齐都的一条东西大道。

就齐国的地理形势来看，形成这条大道是很自然的。济南、历城以南，有泰山山脉，其大舟、岳阳、东泰、大岘、箕屋等山，绵亘而东，直达海滨，为齐鲁的天然分界。

由临淄向西，济南和历城是齐国的董和历下，城子崖和东平陵是齐都的门户。城子崖本为古之谭国，齐桓公二年（公元前684年）“齐灭谭”，但仍存谭。所以，齐国早期刀币中有“谭邦之法化”一种，不似同时期其它刀化铸邑名，而仍称邦。谭入于齐，便成为齐国东西交通的必经之地。李容《重修武原水石桥易名会云碑记》中说：

“镇之艮，武原水上，旧有石梁一座，向传剑桥，为登、青三郡必由之路。”晁（gǎo稿）《重修龙山镇官造石莱冥（ming明）记》说：“平陵西偏龙山镇，西赴省垣，东游渤海之通衢也。”

由临淄向东经昌乐、潍县、平度、莱阳、栖霞转福山、牟平，再向东伸至半岛极东之荣成。这条路线是齐国东去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一条商业运输线。在莱未被齐兼并以前，齐桓公救邢、卫，就“通齐国之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①。”（东莱，就是莱夷，在今蓬莱、莱阳一带）。东莱早已是齐与东夷的商业交通线。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莱，迁莱于郿（nǐ，在今山东滕县东南）。齐灭莱，这条大道打通，而今福山一带就成为当时齐国海上贸易集散地。

2、昌邑、掖县（齐之掖邑）、招远、黄县一线，是齐国在渤海沿岸一条交通大道。这条大道大抵是从国都临淄出发，经今之寿光、昌邑、掖县、招远至黄县，再折而抵福山，这条大道，原来也是东通东莱的大道。就齐国来说，直接关系着鱼、盐，尤其是盐的生产。它是一条重要的鱼、盐运输线。

3、半岛南部沿海的海阳、即墨、青岛、日照一线是当时沿黄海及胶州湾的一条交通线。特别是日照的石臼（jiù）发现的齐币，石臼所紧濒黄海，北距青岛仅六十五海浬。胶县的灵山卫（在今胶南县东北）又出土过三件齐量，是齐的左关（或谓齐之安陵）所在地，可见这条沿海交通线与海程的密切关系。

4、黄县、招远、莱阳、平度、即墨及青岛市北郊一线，是贯穿半岛南北的重要交通之一。这条南北大道的主要部份，原来是莱夷国境的交通旧道。齐人伐莱时，齐晏弱先据东阳（近莱都，时莱都在今黄县东南莱子城），进而围莱。莱公浮柔奔棠（今平度县东南六十里，即墨西北），莱公奔逃的路线，也正反映了贯穿半岛南北交通线的主要部分。齐币出土于平度、诸城、日照一线，这是当时齐国大邑即墨南下的一条交通线。齐之即墨到了战国时，常与国都临淄并举，是齐的王都之一。可见这个城邑是半岛交通线的枢纽。

5、临淄、益都、临朐、沂南、莒南一线，是从齐都临淄南出穆陵关通往莒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齐国伐莒，总是南出穆陵。从春秋到战国中期，是齐、莒之间的交通要道。战国中期以后，是齐、楚之间的接触地带。

6、平度、安邱、诸城、日照一线是莒国国内的南北交通线。莒本都介根（今胶县西南），春秋初迁于莒（今莒县），其疆域包括今山东省安邱、诸城、沂水、莒县、日照等县。莒早在春秋时就是通往吴、越的交通要道。到了公元前四世纪齐占有了莒的大部分的国土之后，这条线成为齐国东南的重要交通路线之一。

①见《国语·齐语》

7、平陵、滋阳一线，是由齐都临淄、西经平陵、南出古阳关（阳关西临汶水）而达兗州的通道。这里与鲁国的关系极密。这条道在战国后期直通于今鲁南的薛城。薛城后来为齐孟尝君的封邑。

8、济南、长清一线，是通往繁华的“陶”、接连午道的一条重要交通线，并有一支线，从长清经平阴，南下至邾（今东平县东）、成阝（今汶上县东北）而达齐鲁边界的汶上。长清本为齐之卢邑，平阴是齐长城西端的要塞。春秋时期，鲁襄公十八年，晋、鲁、宋、卫、郑、曹、莒、邾、滕、薛、杞，小邾等国联军伐齐，晋、鲁、卫等国联军攻平阴以后，遂破齐的京兹和邾（sht诗，在平阴附近），困卢邑，进攻齐都的雍门和四郊。可见自长清经平阴南去邾成阝这条交通支线的重要性^①。

春秋末年到战国，一个经济都会“陶”在山东兴起。《史记·货殖列传》中说：“陶为天下之中”。又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所载，范蠡（1里）辅佐勾践灭掉了吴国，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后来就辗转到了“陶”。他对于陶十分重视，认为这是诸侯四通的地方，也是货物交易的集散地，因而就在这里居住下来。他经营商业，获得厚利，除了有经营商业的才能外，主要还是靠了“陶”这个有四通八达的道路交通。

战国时期，人们曾一再提到“午道”。究竟什么叫“午道”？它究竟在什么地方？东汉郑玄说：“一纵一横为午道”，即交通。唐司马贞说：在齐国西界^②。刘伯庄更具体指出：在博州西境^③。唐代博州，即今山东聊城县，正当齐的西境。现在史学家史念海认为，这一纵一横的地方当是指“陶”而言^④。尽管说法不一，但“午道”在山东当可信服。而且这“午道”，当时在军事上还占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如苏秦说赵时所提的合纵计划，其中有一点就是说，若秦攻齐，楚国就截断秦国的后路，韩国守住城皋，魏军塞住“午道”^⑤。张仪说赵也控制“午道”来恐吓赵王^⑥。楚国有人说楚王，也提到“夜加即墨，顾据午道”的话。从这些事实来，看“午道”的地位置是与当时各国都有重要关系的。

公元前342年，魏国攻打韩国，韩求救于齐。齐威王根据孙膑的建议，在第二年，魏韩均已精疲力竭时，派田忌、田婴为将，孙膑为师，起兵伐魏救韩。齐军从黄河北岸，沿范县（今属河南省）、定陶方向，直走魏都大梁（今开封）。这时，魏将太子申、庞涓逼近韩都新郑。当接本国报警后，立即回师迎战。孙膑素知庞涓骄傲自大、贪功求赏，尤其嫉妒贤良，为人所恨，就采用“减灶诱敌”的计策，率领齐军又从大梁返回，朝马陵进发。开始第一天作十万灶，第二天作五万灶，第三天减为三万灶，以此来制造齐军大量逃亡的假象，迷惑魏军，助长庞涓的骄气。结果庞涓中计，亲自带领轻骑猛追齐军，妄想活捉齐军统帅。孙膑估计魏军的行程，以及到达马陵的时间，就以马陵道路狭窄可埋伏兵的有利条件，在两边埋伏了一万多善射的弓箭手，等待魏军到来。当夜魏军到达马陵，进入齐军的包围圈时，庞涓看到枝干相覆的乱树阻塞在路上，点火看见一棵剥皮的树上写着“死于此树之下！”几个大字，才知道中计，急令回兵。但齐军见到火

①见《从山东出土的齐币看齐国的商业和交通》，朱活，1972年第五期《文物》。

②见《史记·张仪列传索引》

③见《史记·楚世家正义》

④⑥见《河山集》

⑤《战国策·赵策二》

光，万箭齐发，直射魏军。顿时魏军一片混乱，相继溃散。庞涓自知智穷兵败，走投无路，便引颈自刎。魏军主力被全歼。这就是著名的齐魏马陵之战①。

根据以上记载，结合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马陵道在今山东省莘县大张公社马陵道口村附近比较可信。

在七雄争霸中，燕国原是较弱的国家。当燕昭王即位后，就奋发图强，励精图治。“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经过二十八年的努力，终于使得“燕国殷富，士卒乐佚轻战”（《战国策·燕策一》）。燕昭王为了战胜齐国，又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凡“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善用兵者”，燕昭王全收养起来②。乐毅是齐国的亚卿，中山人，原是魏大将乐羊的后代。他帮助燕昭王进行一系列政治改革后，就建议联合赵、楚、魏等国进攻齐国。

公元前284年，燕国动员了全国的军队出征，任乐毅为将军。秦国派尉（官名）斯离率兵和三晋之师会合。赵王以相国印授给乐毅。因此，乐毅就统帅了燕、秦、韩、赵、魏五国的兵力，分路向临淄进攻。燕从蓟（ji记）南下，沿今德州、平原、高唐、茌平、齐河、历城、章丘方向，秦从咸阳，沿今高唐至临淄一线；魏从大梁出征，沿潍水西岸北上，经今高唐至临淄。这时，齐国也动员了全国兵力抵抗，齐兵从临淄出发，沿今周村、章丘、历城方向迎击，大战于济西（济水西面）。齐将触子，没有斗志，与乐毅之军一战就下令退兵，并且单身乘车逃跑，齐军大败。这时齐达子又率领余卒继续与乐毅作战，屯兵于临淄雍门以西的秦周，战不久，达子又战败，并身亡。这时乐毅把秦、韩的兵力遣还，分卫兵攻占旧宋国地，令赵兵攻取河间，自己率兵长驱进攻，直攻入齐的国都临淄，由于燕国的胜利，燕昭王亲自到济上慰劳士兵，并封乐毅为昌国，号昌国君。当时的齐湣王经营逃奔到卫国，后又折回到莒（今山东省莒县）。齐在十分危难之

①详见《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马陵之战的马陵在什么地方，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辞海》“马陵”条解释：“春秋卫地。在今河北大名东南。一说在今河南范县西南。公元前584年晋景公会盟于此。战国属齐。公元前341年，齐将田忌用孙膑计，大破魏军于此，从此孙膑名显天下，世传其兵法。”《范县县志》记载：“周显王二十八年孙膑救韩，伏兵马陵道口，擒魏庞涓。”《观城县乡土志》说：“马陵堤在县东南十八里，接濮州界。春秋成公会盟于此，庞涓死树下，亦即此地云。”《资治通鉴》载：“马陵在濮州东北六十里。”《中国史稿》则说：“马陵在山东范县（1964年划归河南，县城紧靠山东莘县西南边界）。

根据以上记载，结合实地考察，我们认为马陵道在今山东省莘县大张公社马陵道口村附近比较可信。

马陵道口村附近原属范县，后来划归莘县，接近《资治通鉴》中所指在濮州东北六十里的位置，是齐国由此去定陶、大梁的主要道路必经之地。现在这一带由于两千多来黄河河道的无数次变迁和决口，地形已有很大变化，这个村座落在两道大堤之间，北堤年久失修，时起时伏逶迤绵亘，残址犹存；南堤至今依然完好。虽然是平原地带，没有崇山峻岭，茂林深谷，但地势复杂，岐路回旋，房屋斜曲。尤其是村内没有一座房屋方向周正，没有一条街道正直，人行其中，如进迷宫，多不辨方向。备考。

②详见《资治通鉴·周赧王三十一年》

时，楚国派淖齿率兵佯救齐，被任命为齐相。不料，淖齿想要与燕人瓜分齐国，先把齐湣王杀死。

燕将乐毅率大军乘胜追击，齐军望风披靡。燕接着分五路进击：左军渡胶东、东莱（今山东平度、莱西、乳山等县东北广大地区）；前军循泰山以东至海，略琅琊（láng yá狼牙）。右军循河、济、屯阿、鄄以连魏师；后军靠近北海，攻到千乘（今山东高青县东北）；中军占据临淄而镇齐都。燕军经过半年的进攻战，打下齐国七十多个城池。这就是著名的燕将乐毅破齐。